

写作掌故杂谈

潘述羊

四川人民出版社

写作掌故杂谈

潘述羊

四川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金汇海
封面设计：魏天禄
封面题字：陈希仲

写作掌故杂谈 潘述羊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25插页2 字数134千

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70,000册

书号：10118·608

定价：0.76元

GF61117

“文心”可通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这一至理名言，画龙点睛，道出了写作中的最高境界，道出了写作中的辩证法——“必然”寓于“偶得”之中。

写作断无秘诀。然而，却有规律可循。

“定体则无，大体须有”，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写作之“法”，正是寓于“无法”之中，这也许就是“以意役法”、“意法溶一”的意思。

写作源于生活。只要于生活之中，深入体察、勤于积累、善于摸索，必能悟其真谛于万一。入山得山，入水得水，俟神凝于“阿睹”、竹成于襟怀、情溢于唇吻之际，遂奋然命笔，其文必有“行云流水”、“吐珠唾玉”之势，而妙句横生之间，必见警策。要到达这种境界，别无他径，只有“锲而不舍”、“用志不二”、刻苦实践、

代 序

细心体味、反复锤炼，若持之以恒，必裨益非浅。《写作掌故杂谈》想与读者（特别是青年习作者）共同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

“人之于文学，犹玉之琢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历史上的文豪、巨匠，无一不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才逐渐掌握了写作中的客观规律，开始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从而逐步达到“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乃至“运斤成风”的境界的。《写作掌故杂谈》用生动、具体、含义深刻的事例，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本书既凝聚着大师们的“匠意”与“文心”，又凝聚着作者多年写作教学中的甘苦，更凝聚着对青年习作者的殷切期望。料想它在问世之日，必能对读者（特别是青年习作者）有所启迪，遂得“文心”相通之益。权且代序。

卉 子

1982年4月8日

目 录

多读多写	1
“读书破万卷”	4
生活与作文	7
观察	11
得物态，穷物理	13
学慎始习	16
虚心学习	19
一字师	22
文人相轻	27
文思迟速	33
七步、五步与三步	38
早慧	42
文实与言行	46
标题与审题	50
“千里莺啼绿映红”	53

郑板桥论标题	56
“登山采珠”	59
白居易的一份试卷	61
长啸公范镇	64
锦瑟	67
 主题与题材	72
“二句三年得”	76
苏轼续成李柳句	79
谢榛改错唐人诗	82
以意为主	84
题材的增减	88
 谋篇布局	91
曲折	94
凤头、猪肚、豹尾	98
开门见山	100
“打起黄莺儿”	104
起句当如爆竹	106
结句当如撞钟	109
 遣词造句张三影	113
“红杏枝头春意闹”	117
丝竹管弦	121

炼字	124
两种遭遇	128
乌台诗案	131
奔马践死一犬	136
暗香与疏影	140
“池塘生春草”	144
简练	148
贾岛与“推敲”	150
“春风又绿江南岸”	154
当畏后生笑	158
一江水与半江水	161
坚持原则的贯休	164
修改有争议	166
改诗难于作诗	170
“夜半钟声到客船”	172
《新唐书》上的韩愈文	176
不可不改与不可多改	179
范仲淹服善	182
“残菊飘零满地金”	184
知错能改	189
从《卖炭翁》谈改写	192
“寒梅著花未?”	197

东坡纂括《归去来辞》.....	203
山谷纂括《醉翁亭记》.....	208
关于八股文.....	211
八股文写作谈趣.....	215

多读多写

多读多写应是古往今来著名作家取得成就的经验之谈。北宋欧阳修曾说，“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① 所谓看多，包括看别人的文章和揣摩别人修改的稿子。《曲洧旧闻》载：“黄鲁直于相国寺得宋子京《唐史》稿一册，归而熟视之，自是文章日进。此无他，见其窜易字句与初造意时不同，而识其用意之浅深也。”此处所谓“宋子京《唐史》稿”，指的宋祁与欧阳修合作编写的《新唐书》的底稿。所谓做多，就是要勤于写作实践，不要空谈。所谓商量多，指的是跟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多研究。《论语·宪问》上已经有写文章要经过讨论的说法。这道理委实简单，因为“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而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② 唐代的李白与杜甫就是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虽然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二岁之多。杜甫《春日忆李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那情景是多么令人艳羡。他们一起讨论的，既有别人的作品，也必

然有自己的文章。

关于欧阳修谈写作经验，还有一则同上面相类似的记载：

顷岁，孙莘老识文忠公，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出一篇，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③

此外，苏辙在回答“学文如何”这个问题时，也说：“前辈但看多、做多而已。”^④南宋词人姜夔总结写作经验为八个字：“多看自知，多作自好。”^⑤鲁迅在致赖少麒的信中写道：“文章应该怎样做，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和方法。”象这样的经验之谈，在我国历代的文论著作中真是不胜枚举。

至于实践“勤读多为”这一原则，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作家，可以举出梅尧臣和陆放翁两人为代表。

曾经讲过“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这两句名言的梅尧臣，字圣俞，是北宋大诗人。“苕溪渔隐曰：旧说梅圣俞日课一诗，寒暑未尝易也。圣俞诗名满世，盖身试此说（按：指‘勤读多为’）之效耳。”^⑥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一生写诗万余首，古来作诗之多，没有人超过他。稍晚于陆游的刘克庄曾经讲述一段经历，他说：“昔梅圣俞日课一诗。余为方孚若作行状，其家以陆放翁手录诗稿一卷作为润笔。题其前云：七月十一日至九

月二十九日，计七十八日，得诗一百首。陆之日课尤勤于梅。二公岂贪多哉！艺之熟者必精，理势然也。”^⑦

上面举了一些关于多读多写的掌故，意在告诉青年同志，学习写作应当有一股子狠劲，要下定决心，多读多写，持之以恒。须知多读多写乃是写好文章的必要条件，但我们也并不认为只要多读多写了，就一定能成为大手笔的。所谓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说的正是这种必要条件。因为写作的问题，除了读书借鉴，加强练习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世界观的问题以及生活实践的问题。这些问题，我将在其它的题目里，另作阐释。

注释

- ① 陈师道《后山诗话》。
- ② 白居易《与元九书》。
- ③ 《诗人玉屑》卷五，“勤读多为”。
- ④ 苏籀《栾城遗言》。籀为苏辙之孙，此书就是追记其祖父之言，以示后代的。
- ⑤ 《白石诗说》七则。
- ⑥ 同注③。
- ⑦ 《诗人玉屑》卷五，“艺熟必精”。

“读书破万卷”

杜甫三十七岁那年，在长安写下了《赠韦左丞丈（济）二十二韵》，其中自述学习写作的经验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个说法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据说有人问王安石：“老杜诗何故妙绝古今？”王安石答复说：“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①至于何以书读多了就能把文章写好，元代有人曾经打过一个譬喻：

读书如销铜：聚铜入炉，大鞴扇之，^{鞴，bèi}_{（风箱。）}不销不止，极用费力。作文如铸器：铜既销矣，随模铸器，一冶即成；只要识模，全不费力。所谓劳于读书，逸于作文者此也。^②

当然，写作的问题，既有世界观的问题，还有生活实践的问题。英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小说家亨利·费尔丁指出：要成为一名作家，首先是天才，其次是人道，再其次是学问，最后是经验。这位持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立场的小说家，十分强调天才与人道是很自然的；但他说：只有通过经验，“人们才知道人类的性格，隐居在书斋里的学究无论

天赋多高、学识多博，是从来不了解的。”^③ 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在我国东汉时代，就连非常重视论说文写作的王充，也曾经尖锐地批评了那种以读书多少，作为品评作者的高下标准的不正之风。他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④

不过，无论如何读书与写作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是密切的。一方面固然有借鉴的作用，而另一方面还有继承别人的知识，读书明理的作用。所以严沧浪在谈到诗歌的创作时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⑤ 即使是写小说道理也一样，茅盾说得好：

我们要排斥贪省力的走马看花似的左拉式的方法。但是我们不能连“搜集材料”这意见也排斥。我们鄙弃左拉式的从书籍中去搜找，但是我们并不能忽视书籍对于我们“搜集材料”时的帮助。^⑥

《随园诗话》记载了一段有趣的争论。据说苏东坡批评唐代诗人孟浩然，认为孟的诗不是不佳，只可惜“作料”少。清初诗人施愚山不同意苏东坡的看法，反嘲道：苏东坡的诗不是不佳，只可惜“作料”多。施愚山觉得，诗如人的眼睛，一道灵光，眼珠里是容不得金屑的；至于“作料”之类的东西怎能在诗中去找寻呢？但也许有人会追问道：“诗既然不贵用典故，何以杜甫又有‘读书破万卷’的说法？”《随园诗话》的作者袁子才回答是这样的：人们不懂得“破”与“有神”三字，全是教人读书作文的方法。“盖

破其卷取其神，非囫囵用其糟粕也。蚕食桑而所吐者丝，非桑也。蜂采花而所酿者蜜，非花也。”

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里高度评价了袁子才的意见，并为扩充其意而成六言八句：

蚕食桑而吐丝，蜂采花而酿蜜。

牛吃草而出奶，树吸壤而生漆。

破其卷而取神，吮其精而去粕。

融宇宙之万有，凭呕心之创作。

郭沫若的这首六言诗写得不错，他充分肯定了读书对于写作的重要性，而且表达得如此形象生动。只可惜他过分拘泥于袁子才的说法，把书籍当作写作的原料，强调去粗取精，而忽略了读书能使人聪明、增人才干这个极其重要之点。诗的最后两句虽然也可以解释为创作当以“宇宙之万有”作为源泉，但紧跟着蚕食桑、蜂采花、牛吃草、树吸壤、人读书等五个比喻之后，这里的“宇宙之万有”显然就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作为文学艺术的源泉的“生活”了。

注释

- ① 《诗人玉屑》卷十四。
- ② 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
- ③ 转引自《西方文论选》上册。
- ④ 王充《论衡·超奇》。
- ⑤ 严羽《沧浪诗话》。
- ⑥ 《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版，第463页。

生活与作文

生活是写作的源泉。这一判断反映了客观真理，这一判断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区别于唯心主义的文艺理论的根本原则。我国现存的较早古籍《尚书》，记载了上古时代“诗言志”的著名的文论纲领。唐代的孔颖达在《诗大序正义》中对所谓“志”作了解释，指出：“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这事实上正是对生活与作文之间的关系的具体分析。由于诗歌反映了生活，所以统治阶级十分重视它，派出了许多官吏，负责收集。班固《汉书·艺文志》指出：“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陆机的《文赋》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文艺理论著作。这篇著作一开头就谈到了生活与作文之间的关系问题。陆机写道：“伫中区以玄览。”伫，久立；中区，犹区中，谓宇宙之中；玄览，就是深刻地观察。这一句的意思是说：从生活中观察万物，才能引起文思。接下去陆机又说：“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这就进一步分析了生活于四季变

迁、万物盛衰的客观世界中，意识、感情来源于物质，文学创作植根于生活的道理。唐代的伟大诗人李白与杜甫，伟大散文家韩愈与柳宗元都是由于深入生活实践，再加上其它的条件，才成就为一代宗匠的。

关于这一点，汉代伟大的历史家、散文家司马迁的生活经历最能说明问题。

司马迁出生于一个有广博学问修养的知识分子家庭。年轻时候“耕牧河山之阳”从事过生产劳动。后来向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二十岁那年开始了漫游生活：“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阙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①归后，仕为郎中，又“奉使西蜀，南略邛笮昆明”。以后又因侍从汉武帝巡狩封禅，游历了更多的地方。他在旅行中非常注意调查研究，采访遗闻佚事。例如，他初到淮阴的时候，听到人家说：韩信微时，志不在小，当他母亲死了，虽无以为葬，却不顾一切营求到墓旁可住万家的葬地。司马迁便亲自去参观了韩信母亲的坟墓，而后信其言之不虚。他在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一带，更深入了解汉初史迹的宝库，刘邦、萧何、曹参、周勃、卢绾、樊哙、夏侯婴（滕公）、周昌、周绁都出生在这一地区，给予他博访周咨的机会。他除采访汉高祖在乡间好酒色的故事以外，还对这般人屠狗卖缯的生活，作了仔细的调查。^②后来他把游历时期的所见所闻，都写入了自己的著作。所有这些实践